

杜甫詩選讀

黑龍江
人民出版社



杜甫诗选读

周蒙 冯宇

人民文学出版社



封面设计：蒋明、王祖珍

书 题 字：李延沛

杜 甫 诗 选 读

周 蒙 冯 宇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林林街 42 号)

黑 龙 江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黑 龙 江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9 6/16·插页 2·字数 193,000

1990 年 6 月 第 1 版

1982 年 6 月 第 2 次印刷

印数 94601—145,200

统一书号：10095·290

定价：0.95 元

前 言

我国的唐代，是诗歌发展的光辉灿烂的黄金时代。这时诗人辈出，如同群峰并峙，其中杰出的代表之一，便是出现在李白之后，白居易之前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他以毕生的精力，辛勤地从事创作，写下了一千四百多首诗歌。这些诗歌深刻地揭示了“安史之乱”前后唐代由盛而衰的社会面貌；广泛地反映了这一历史转换时期的阶级矛盾和政治事件；真实地表现了诗人热爱祖国和同情人民的思想感情。这些诗歌，无论在思想上或艺术上，都达到了超越前代的水平，扩展了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把古典诗歌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对后代文学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因而成为留给我们的极其珍贵的文学遗产。

(一)

杜甫（公元七一二——七七〇），字子美，原籍湖北襄阳人，后迁至河南巩县（诗人于唐玄宗先天元年出生在这里）。他出自于“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鸥赋表》）的封建官僚之家。远祖杜预是晋代有名的大将。祖父杜审言是唐武后时代著名的诗人，当过国子监主簿和修文馆学士。父亲杜闲曾作过奉天县吏。到了杜甫出生的时候，家境败落下来，但却依然享有“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特权。“诗是吾家事”，不消说，他自幼便笼罩在书香门第的文学氛围里，受到儒家传统的思想教育。这对他以后的生活和创作，都曾有着不小的影响。

诗人在他晚年所写的《壮游》一诗里，曾说他七岁时就会赋

诗：“开口咏凤凰”，九岁时就能书写大字：“有作成一囊”；十四、五岁时就有社交活动：“出入翰墨场”。由此可见诗人从小便是勤奋好学，才智早熟的。到了青年时代，他又由在家“读书”，进而出外“行路”。二十岁到三十五岁的十多年间，他曾南游吴越，北游齐赵。漫游的足迹所到之处，有现在的浙江、江苏、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地。他游历了祖国的名山大川，饱览了各处的名胜古迹，丰富了经历，增长了知识，对他的诗歌创作，是大有益处的。唐朝的开元天宝年间，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正是“全盛”时期。诗人过的是“裘马颇清狂”的放浪不羁的生活，在漫游中，耳闻目睹的是一派“太平景象”。人们的思想和精神状态，主要是积极奋发，昂扬豪迈的。诗人深深地被这种时代精神所熏陶感染，他写出了气势奔放，格调高昂，充满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精神的诗篇。诸如《望岳》、《房兵曹胡马》、《画鹰》等。更使他高兴难忘的是，在漫游期间，曾经结识了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和著名的边塞诗人高适。他们志同道合，一见倾心，结下了深厚而真挚的友谊。三位才气纵横，风华正茂的诗人，白天“携手同行”，夜晚“醉眠共被”。这在杜甫的心灵上，深深刻下了永不消失的美好印象，以致于分别多年以后，还促使他不断写出怀念诗友（特别是李白）的许多动人的诗篇来。

唐玄宗天宝五年（七六四），杜甫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和“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迫切愿望，首次到京城长安去应试，以便借此踏上封建士人当官为宦的必经之路。当时唐玄宗曾下诏：天下凡有一艺之人，皆可进京应试。可是由于唐玄宗李隆基日益昏庸腐朽，重用奸臣李林甫和杨国忠，致使国势开始衰败下来，政治也日趋黑暗，朝政大权全被李杨奸臣所把持。李林甫唯恐贤良之才进入朝廷于他们不利，便玩弄了一个“野无遗贤”的骗术，结果使应试者

“无一人及第”。理想破灭，愿望未遂，诗人从此便开始了困居长安十年的艰苦生活，处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跌落到了“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窘困境地。为了寻求政治上和生活上的出路，他不得不曲意干谒，逢迎别人，向达官权贵投简赠诗，以期得到他们的援引。他甚至还向玄宗皇帝进献过《三大礼赋》，希望得到赏识，以求进身。但是，冷酷的现实却使他的这一切努力归于无效。直到第十个年头上，他才被朝廷派了个河西尉的官职，可是他却拒绝了。因为诗人实在不肯昧着良心，去干那种“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高适《封丘作》）的县尉差事。他宁愿继续过着“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投简咸华两县诸子》）的贫苦生活。后来，又让他改做了一个掌管兵器的小官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他才接受，从此结束了困居长安十年的布衣生活。正是这十年的痛苦辛酸，使他清楚地看到了“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黑暗现实，理解了人民有着比他更大的不幸，比较深刻地洞察了日益激烈的各种社会矛盾。这一切使他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成为他逐渐形成进步世界观的前提和起点。他写出了许多揭露黑暗现实，同情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诗篇。其风格、情调，也由早期的热情奔放，乐观坦荡，而变得开始凄凉悲壮，“沉郁顿挫”了。

14 天宝十四年（七五五）的十一月间，爆发了祸国殃民的“安史之乱”。从此，大唐帝国便由统一安定变成分裂动乱，由经济繁荣转为民生凋弊；唐代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复杂。这次变乱，是杜甫生活道路和创作历程的转折点，此后他经历的是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涯。诗人在长安做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不久，安史叛军便攻下东都洛阳，接着长安也相继沦陷。七五六年八月，诗人听说避难西蜀的玄宗，已册立新皇肃宗在灵武即位，他便把

家眷安顿到鄜州羌村，只身赶往灵武，途中被叛军所俘，押回长安。他亲眼目睹昔日繁华的京城，而今遭到洗劫的惨象，以及叛军杀戮掠夺的野蛮罪行。这一切都引起了诗人的极大愤怒；长安城外官军屡遭失败的消息，更使他万分悲哀。他把这种种所见、所闻和所感，真实地作了亦诗亦史的记录，这便是《哀江头》、《哀王孙》、《悲陈陶》、《悲青坂》等诗篇的创作。七五七年四月，他终于伺机冒险只身逃出长安。由于爱国之心的促使，他急奔赴凤翔，去“麻鞋见天子”（《述怀》），肃宗让他当了谏官左拾遗。任上遇到房琯事发，他本着忠于谏官职守的精神，上疏营救房琯，竟触怒了肃宗，几乎获罪。幸亏张镐的营救，才免祸患，但终被肃宗放还鄜州探家，得到变相惩罚。著名的诗篇《北征》和《羌村三首》等，写的就是这次回家的见闻和感受。七五七年九月，官军收复长安，他继续任左拾遗，终日侍奉皇帝，生活天地变得狭小，没有写出什么好诗篇来。七五八年六月，诗人终因房琯事件，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这次遭贬，政治上是个不幸；创作上却是个大幸。诗人再一次有机会投身到现实生活的源泉中去，同人民群众有了更多的接触，他的眼界又开阔了，他的诗情又迸发了。他从洛阳回华州的途中，看到了广大人民是怎样在兵荒马乱中痛苦挣扎，为使国家免遭灭亡，人民付出了巨大代价；官府不顾百姓死活，不合理的赋税和兵役制度，强加在人民的头上，致使他们妻离子散，走死逃亡。灾难深重的时代，震撼着诗人的心灵。他为祖国的命运而焦虑忧愁，为人民的不幸而愤懑不平。于是产生了他不朽的诗作《三吏》、《三别》等篇。之后，在华州任职不久，诗人又弃官西行，继续颠沛流离，到了秦州、同谷一带地方。这一时期，他将妇挈雏，一家人常在饥寒交迫中奔波度日。“天寒日暮山谷里”、“三年饥走荒山道”（《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便是这段经历的真实写照。

七五九年的冬天，杜甫从西北同谷漂泊到西南成都。当时成都未遭战乱，保持着某种程度的稳定局面，他便暂时安居下来。七六〇年的春天，全靠亲友的周济，诗人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营建了一座草堂。此时虽有安身之处，也只能靠自己耕种一些草药和亲友资助，方能维持生活。但今非昔比，生活环境变迁，比较闲适安定，使他有可能细致地观察大自然界的变化，创作出不少以山水田园、自然景物为吟咏对象的清新隽永的诗篇，诸如《春夜喜雨》、《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水槛遣心》等等。然而这种闲适安定是有限度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诗中所记述的狼狽景象，便是最好的说明。七六二年，成都少尹兼御史徐知道在成都叛乱，杜甫为了避难，不得不举家流亡到梓州。七六三年，他终于听到了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消息，混战了七、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到底平定了下来。他当时极度兴奋的心情，真是难以抑制。他幻想从此离蜀东下，返回思念已久的故乡，以便结束这漂泊流离的生活。可是，事实上国家并未从此稳定，藩镇叛乱仍旧接连不断。因此，他重返家园的愿望终于落空了。七六四年，杜甫的朋友严武，作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于是诗人又返回了成都草堂。在严武的保荐下，他作了检校工部员外郎，这是他最后一次踏入官场。诗人这时已年过半百，很难再适应那种忙碌终日的幕僚生活，加之他憎恶官场的勾心斗角，机巧权诈，政治抱负又得不到申展，而且严武不久也死去，诗人便辞官另谋生路了。七六五年，从成都乘舟东下，经嘉州、戎州等地，于七六六年到达了夔州（四川奉节县），度过了两年贫病交加的生活。此时，诗人更加了解社会下情，与人民的关系也更加接近，因而写出了象《负薪行》等那样的抨击社会恶习，反映人民疾苦和他们理想愿望的名篇。七六八年，杜甫从夔州东行出峡，流寓到湖南、湖北一带。这一时期，社会地位的寒微，困苦生活的磨炼，使得他的创作更

富于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他忧国忧民的进步思想更加成熟，写下了许多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统一的作品，诸如《又呈吴郎》、《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岁宴行》、《蚕谷行》等等。七七〇年（唐代宗大历五年），诗人在赴郴州的途中，旧病复发，病倒在一条破船之上。在一个大风天里，他卧病写出了最后的绝笔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这是弥留之际他为自己所唱出的哀惋凄怆的挽歌。到此，诗人壮志未遂、空怀家国之思，便含恨九泉了，时年五十九岁，有《杜少陵集》传世。

(二)

杜甫诗歌的思想内容博大精深，恰如“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宋祁《新唐书》）。按照杜诗编年的顺序读下去，便会令人感到这既是在读诗，又是在读史。它既有形象的鲜明性，又有历史的真实性。而超越一般编年史或断代史的突出特点，便是它具有着艺术的感染力量。使我们好象摸到了那个时代动乱的脉搏，闻到了那段历史特有的气息，看到了那个社会斑驳的色彩。所以，晚唐孟棻《本事诗》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可见，后世人们公认杜诗为“诗史”，不是没有缘由的。读完全部杜诗，我们又不能不感到，杜甫政治抒情诗的比重之大是何等惊人。从盛唐到中唐几十年间的大小政治事件和时局变化，都能从杜诗中听到及时的反响和切实的评论。又可见，毛泽东同志在参观杜甫草堂时曾指出：杜诗为“政治诗”，是非常正确的。

杜诗作为“诗史”和“政治诗”来说，其最突出和根本的标志是：它真实而集中地概括出了“安史之乱”前后唐代从盛到衰整整一个时代的历史动向和社会全貌，揭示了那个时代现实生活的各种矛盾和本质问题。诸如社会政治的黑暗，统治阶级的腐朽，国

家命运的危机，人民生活的饥寒，以及自身遭遇的不幸等等。总之，举凡唐代的“世上疮痍”和“民间疾苦”，全都化作了这位“诗中圣哲”的“笔底波澜”。

“安史之乱”爆发之前，唐代诗歌普遍呈现出一种所谓“盛唐气象”。但由于杜甫政治上的敏感和洞察力的深邃，他却看到了人们所未看到的，感到了人们所未感到的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杜甫在诗中揭露了所谓“太平盛世”假象后面隐藏着严重的政治危机。他通过艺术的概括，在《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一诗中，对此作了形象的写照：“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诗人高瞻远瞩，已经预感到了祖国危机、祸乱将起的不祥征兆。“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在思念尧舜贤君而不可得的感叹里，对当今耽于淫乐作“瑶池饮”的皇帝，寄寓了委婉而尖锐的嘲讽。“黄鹄”的“哀鸣”远去，“随阳雁”的“稻粱谋”，又鲜明对比地暗喻了志士的失意和小人的当权，无不是对朝政黑暗的大力抨击。诗人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揭露“安史之乱”前唐代社会的黑暗更为深刻尖锐。他忧愤地指出：“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封建统治集团的穷奢极侈，是酿成政治危机的祸端。“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封建王公大臣挥霍无度的生活，是建筑在残酷地剥削人民的基础之上的。正是这种朝政黑暗和剥削制度，造成了极端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千古不朽的名句，不但一针见血地揭露出了唐代社会的本质特征，而且也是对整个封建社会阶级对立现实的典型概括。与阶级对立的现状相联系，诗人还揭露了“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那种极不公正的历史真实。这是对李林甫、杨国忠之流把持朝政致使时事恶浊的强烈不满。诗人还往往通过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被冷落排斥，以及自身坎坷不平的遭遇和理想

的不能实现，具体生动地揭示出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象《醉时歌》，就是以犀利的笔触，猛烈抨击时政的诗篇。“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梁肉，广文先生饭不足。”对于占据要位，尸位素餐的高门大族，投以辛辣的讥讽；对于官卑职冷，茶饭不继的广文先生，抱以无限的同情。诗题虽作《醉时歌》，实际上诗人的政治头脑是十分清醒的，甚至清醒到能够明智地提出“孔丘盗跖俱尘埃，儒术于我何有哉”的深沉发问。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慨叹，对于社会现实的不满，已促使他发展到了对封建制度所赖以存在的精神支柱即儒家教义，发生怀疑动摇的地步。可见他对这个黑暗的社会存在，是何等深恶痛绝。

政治黑暗，朝政腐朽，这都是以皇帝为头子的封建统治阶级所造成的。所以，诗人又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他们，便产生了杜甫大胆揭露他们昏庸腐朽的许多诗篇。《丽人行》可作代表。诗中具体地揭露了这样的历史事实：由于唐玄宗日益昏庸腐朽，极力宠幸杨贵妃，杨氏兄妹便因裙带关系而飞黄腾达。他们在唐玄宗的包庇纵容下，政治上气焰嚣张，骄横恣睢，不可一世；生活上奢侈享乐，纸醉金迷；道德上堕落无耻，荒淫乱伦。这首诗对封建社会上层统治集团的丑恶和罪行，讽刺得极为尖锐深刻，很有典型的意义。封建统治阶级为了满足享乐，贪婪无厌，对内残酷地盘剥人民，不顾百姓死活；对外则好大喜功，发动不义战争。唐玄宗为了满足扩张的野心，一味穷兵黩武。杜甫在《兵车行》、《前出塞》等诗中，便对此作了无情的谴责和质问：“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诗人指出这种不义之战，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增加了人民负担：“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真实地反映了屡征南诏和吐蕃所造成的严重社会问题。在这

种穷兵黩武中，安禄山乘机扩大兵权，邀功升迁，蓄谋反叛。养虎成患，终于招来了祸国殃民的“安史之乱”。这是多么惨痛的历史教训。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历史的转折点。从此，那个所谓“太平盛世”，便被国势衰败所代替，接踵而来的是战争动乱，分裂倒退，整个国家处于危机之中。因此，反映国家命运的危机，表达热爱祖国的情感以及和平统一的愿望，便成为杜诗重要的思想内容。《北征》一诗，是反映国家破败不堪，关心祖国命运的代表作品。它形象地再现了“乾坤含疮痍”的凋蔽景象，“呻吟更流血”的苦难现实。诗人对于安史叛军，表现了极大的义愤，对于朝廷借兵回纥，吐露了内心的忧虑。但对于国家的未来，却充满了必胜的信念。其他如《喜达行在所三首》、《述怀》、《羌村三首》等篇，也无不表达了诗人忧念国事的思想情怀。杜甫被俘身陷长安时，耳闻目睹安史叛军滥杀王孙公子，他对受害者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哀王孙》）。面对春日里曲江岸边的“细柳新蒲”又一度萌生，可是已经物是人非，联想到而今“胡骑满城”的现实，又引起了他的极度的痛心（《哀江头》）。至于《悲陈陶》、《悲青坂》，更是对安史叛军烧杀掠夺野蛮行径的声讨，对义军健儿流血牺牲的哀悼。他时刻不忘由于战乱而造成的社会灾难：“山雪河冰野萧瑟，青是烽烟白是骨。”他密切关注平叛的胜败得失：“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他甚至在《塞芦子》诗中，为官军谋划作战方案，提出扼守芦子关的具体建议，充分表现了他为国事而深谋远虑的良苦用心。国家命运牵动着他的诗思，就连冬去春来大自然界的变化，都会勾起他睹物伤情，忧念国事。“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这感人至深的诗句，把诗人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对时事艰难的忧虑，全盘托出。他把个人的身家不幸和社会动乱，也密切交织在一起了。诗人在旅途

中，曾看到往日壮丽的玉华宫，经过战乱，而今变得一派凋零，也禁不住触目伤心，而“浩歌泪盈把”（《玉华宫》）。当他有机会登楼远望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祖国壮丽的大好河山的千姿万态；锦江两岸的迷人春色，玉垒上空的悠悠白云（《登楼》）。但这并没有使他陶醉，反倒引起了他的“万方多难”的忧国之思。从视线所及的后主祠庙，感叹刘禅昏庸，重用黄皓而终致亡国，以影射当今代宗皇帝重用鱼朝恩辈所酿成的祸患。诗人又联想到诸葛亮及其《梁甫吟》，以暗喻自己的慷慨悲歌，从而剖露了他请缨无门，大志未遂的一片赤诚的爱国之心。杜甫对国家命运的关注，还往往表现在他对和平统一的热切愿望上。“安得壮士挽天河，洗净甲兵长不用！”（《洗兵行》）“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蚕谷行》）这不仅是诗人自己的呼声，也是那个动乱时代广大人民的共同心愿。因为只有国家和平统一，人民才能男耕女织安居乐业。所以，当他听到官军终于收复了河南河北等地的消息，竟然欣喜欲狂，老泪纵横，放歌纵酒，幻想还乡（《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然而，无情的历史事实，却与诗人的愿望相违，祖国的和平统一，并没有就此实现。诗人一生，始终在为祖国的不幸命运而牵肠挂肚，忧虑不已。直到他临终，在《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的绝笔诗中，还置自己死活于不顾，写出了“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的动人诗句。可见统一祖国、和平安定的希望未能如愿，诗人是死不瞑目的。

当然，杜甫关心国家命运，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是复杂的。他反对叛乱割据，希望国家统一，这有历史进步意义，值得赞许。但他的爱国思想往往和忠君思想交织在一起，常把国家中兴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他自称对君王象“葵藿倾太阳”那样的忠诚，甚至达到“每饭不忘君”的程度。这虽是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所造成，但也应该指出有加以批判的必要。

杜诗最为使人推崇的，是他那些描绘人民生活，同情人民疾苦的篇章。这类篇章，数量很多，呈现出了高度的人民性。闪烁着现实主义的艺术光芒。早在诗人困居长安十年的作品里，就曾表达了他对民间疾苦的深切同情。“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由于诗人对当时的现实生活体验很深，所以相当深刻地看到了劳动人民不幸遭遇的真象。他自己的娇儿，因为饥饿而被夺去了生命，他没有只是沉浸在“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的悲痛之中，而是由此联想到广大人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关心他们比自己更加不堪设想的生活处境，发出了“忧端齐终南，颓洞不可掇”的无限悲伤。在《秋雨叹三首》中，对秋雨害稼，米贵伤农的民间疾苦，也有着真实的反映。“安史之乱”发生后，诗人有了更加广泛深入地接触现实生活的机会，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同人民的感情进一步深厚起来。反映到诗篇里，便是《三吏》、《三别》等杰出诗篇的创作。诗人一方面无情地揭露了毫无人道的兵役制度所强加在人民头上的深重灾难；一方面又竭力鼓舞人民的抗敌热情，讴歌了他们忍痛牺牲，挺身救国的高尚精神。热爱祖国和同情人民的主题思想，在这些诗篇中，得到了尽善尽美的艺术表达。封建传统的儒家思想，是主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杜甫，却偏穷苦而有兼济之志。当他自家的茅屋为秋风所破的时候，他却想到了天下的“寒士”。他渴望得到“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为了实现这理想，他宁可“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充分表明诗人已不完全为儒家思想所囿，其高尚的道德情操，难道不值得尊重吗！这种“兼济之志”，还体现在他对被压迫在最底层的妇女不幸的同情上。《又呈吴郎》一诗，就描写了老寡妇在“戎马”战乱和官府“征求”的艰难岁月里的困苦真象。诗人以诗告诫吴郎不要干涉老妇打枣，对她的疾苦表

现出无微不至的关怀。《负薪行》所展示的是夔州一带地方，劳动妇女因遭丧乱，老大不嫁，终年劳苦，以泪洗面的生活画面。“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诗人不但热情地歌颂了劳动妇女吃苦耐劳的可贵品德，同时也愤怒地驳斥了封建统治阶级诬蔑劳动妇女的恶语。更为可贵的是，诗人在反映民间疾苦时，还能够揭示出疾苦的社会原因。由于社会生活本身的特点，使这位忠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时代歌手，找到了鲜明对比的方法。他把一切都放进了阶级矛盾中去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便是富于典型性的例证。“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岁宴行》），“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述怀》）等等，都是用人民的疾苦对照统治阶级的享乐，从而指明了残酷的剥削制度，是造成人民不幸的社会根源。诗人甚至大胆而激愤地说：“不过行检德，盗贼本王臣。”（《述怀》）由于封建朝廷不施仁政，没有奉行“俭德”的政策，才迫使本来都是臣民百姓的人走投无路，成为“盗贼”，意即“官逼民反”。他竟敢指责朝廷，为“盗贼”鸣冤叫屈，这实在是这位正视现实，富于正义感的诗人难能可贵的地方。

但应当指出：杜甫毕竟是一位封建时代的诗人。他同情人民疾苦，反映他们的感情和愿望，为他们伸张正义而发不平之鸣，这是积极的一面。然而，他不能也不可能认识到广大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当人民群众一旦真的揭竿而起，要推翻诗人所不断揭露的黑暗的封建制度时，他便又持反对的态度：“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喜雨》）这诗句表明诗人的基本立场仍是个王权拥护者，而不是封建制度彻底的叛逆者，在他身上还分明显示着世界观的局限性。

杜诗的思想内容，除上述几个方面之外，还有大量怀赠友人，自然山水，纪游咏物，论诗题画，遣兴微吟等类诗作。这些作品，大都表达了诗人的真情实感，并非为赋新诗而无病呻吟的文字游

戏。例如《梦李白二首》、《赠卫八处士》等诗，其中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洋溢着真实动人的情意，并刻着那个时代的烙印。那些恰似用工笔勾勒皴染的自然山水画卷，也都很出色成功，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特别是诗人入蜀以后所写的这类作品，可以看出祖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会勾引起他的诗兴。诗人善于观察并揭示出自然景物的特征和变化，细致入微地把它们聚集在笔底，仿佛在放大镜下得到逼真的再现，难怪后人尊称它们为“图经”了。例如《登高》、《春夜喜雨》、《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水槛遣心》等诗，全都倾注着诗人饱满的感情，而且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地步。足能唤起人们对祖国江山的热爱，激发起人们积极进取的精神。咏物、题画之类的诗，常能作到“物微意不浅，感动一沉吟。”（《病马》）也写得非常生动传神。例如《房兵曹胡马》、《古柏行》、《朱凤行》等，诗中既是咏物，又是托物寓意，或表达理想愿望，或抒发襟怀志向。吟咏对象，又莫不刻划得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引起读者极大的兴趣，给人留下清晰的印象。至于其他，便可略而不谈了。

胡宗愈《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诗碑序》说：杜诗“读之可以知其世”。这“知其世”三字，高度概括出了杜诗思想内容的重大特点。是啊！诗人把当时人世间和社会上所存在的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以及重大的时事政治变动，无不广泛而深刻地包容在他的诗篇里。人们读他的诗，仿佛读史，因而有“诗史”之说。总之，要是把杜诗看作反映唐代“安史之乱”前后社会历史真象的一面镜子，不是很恰当的吗！

(三)

在我国古典诗歌史上，杜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高度完美统一的典范。

首先，诗人成功地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现实生活。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是指“从既定的现实的总体中抽出它的基本意义而且用形象反映出来。”（高尔基）杜甫一生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总是从现实出发，善于挖掘那些能够揭示生活基本意义，而且又具有代表性的事件，经过艺术概括，加工提炼，把它们形象地再现出来。因此，他的作品具有真实性和典型性。例如他的一些叙事性较强的诗篇：《兵车行》、《丽人行》、《三吏》、《三别》等等，虽然都只是记叙了一个生活侧面，描绘了一个具体事件，但却都是从社会生活或事件的总体中，概括出了它们的“基本意义”。也就是揭示出了那个历史时代和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和本质特征。他的那些政治抒情诗，同样也都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产物。他所抒发的“情”，由现实所激发，被生活所决定。例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的激动和喜悦之情，《月夜》、《春望》中的痛苦和忧伤之情；这既是诗人自己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也是那个乱离时代人们共同的感情。透过这种感情，令人体会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现实情景。所以，我们说杜诗中所表达的，乃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感受。杜诗现实主义的艺术成就，比之前代和同代的现实主义，无论在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或深度上，都是一座光辉突出的诗歌丰碑。

其次，杜诗具有“沉郁顿挫”独特的艺术风格。“沉郁顿挫”一语，本是杜甫的“夫子自道”，即他对自己作品的评价。后人评论杜诗便也以此称其风格，但对其含义，却众说纷纭。我们以为“沉郁”是就内容而言，“顿挫”是就形式而言。概而言之，这种艺术风格是由诗篇蕴藉的深厚广博，意境的雄浑悲壮，语言的遒劲刚健，音调的铿锵和谐，章法的波澜曲折诸种因素构成的。这主要是指他中年以后所写的一些作品。因为诗人遭遇了干戈离乱，饱经了漂泊饥寒的忧患，阅尽了人间深重的苦难，家国之思积于满腔，